

錢
文
忠
集

瓦釜集



钱文忠 著

瓦釜集

钱文忠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釜集 / 钱文忠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36-8346-4

I. ①瓦… II. ①钱… III. ①佛教—文集 IV.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7817 号

书 名 瓦釜集

著 者 钱文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策划编辑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金 龙

特约编辑 耿江秀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出版日期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照 排 灵动视线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640mm×890mm)

印 张 15.5

字 数 1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8346-4

定 价 36.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建议陈列类别: 社科 作品集

目 录

序一 / 1

序二 / 2

恒逻斯之战 / 4

《痴华鬘》撰者姓名小考 / 8

西书东说十则 / 10

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 / 37

佛教传入日本时间杂说 / 47

国故与新知的称星 / 56

又一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 63

杂感两片 / 68

也说文化接榫期 / 71

出入世间：宗教与商人 / 75

读《梵学集》 /	81
近现代佛教复兴断想 /	91
年代——历史学的终结？ /	96
沈曾植其人其学 /	101
神州袖手人陈三立 /	110
男爵及其幻想：纪念钢和泰 /	128
侠儒经师黄季刚 /	136
陈寅恪印象 /	145
周叔弢与自庄严堪 /	153
江流世变心难转 /	158
郑振铎与战乱中的文献 /	163
季羨林教授学述 /	174
藏书·读书·译书·著书 /	186
季羨林与梵学研究 /	189
经师人师的风范 /	192
记马雍先生 /	196
追忆赵国华先生 /	200
后世相知或有缘 /	203
义宁精神与陈学研究 /	207
评《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	210

命缘之间 / 213

读余英时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 216

如此“整理” / 219

周一良先生与《唐代密宗》 / 222

“精选”与“集粹” / 226

《走出疑古时代》 / 228

搬书苦乐 / 231

后记 / 234

序一

季羨林

文忠哀其近数年所为文，编为一集，名之曰《瓦釜集》，不远千里，索序于予。予喜而应之。予惟文忠，英年岐嶷，苦读不倦。开电灯以继晷，恒通宵以达旦。中西兼通，古今同嫻。刮垢磨光，探幽钩玄。手不停披，梵书佛典。张皇妙谛于字里，犀照真理于行间。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士林中多有知之者。编文集而名之曰《瓦釜》，或系取自《楚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此文忠自谦之辞。实则集中固多黄钟大吕之声，非瓦釜所能出也。今之学坛上颇有自命为黄钟大吕而实则为瓦釜雷鸣者，较之文忠，有高下之别矣。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朱子已有“少年易老学难成”之诫。文忠勉乎哉！

1998年1月7日

序二

王守常

文忠老弟选其近年所著文章辑为一集刊行，嘱我作一序文。我记起章学诚有言：“书之有序，所以明作者之旨，非以为观美也。”我赞同此说，故欣然为序，也来介绍我所了解的文忠，如孟子所说，读其书知其人。

我与文忠相识在 1989 年夏，那时节北京大学已成空寂，我亦不难安心读书，常坐朗润园后湖边与友闲谈。不知何时，文忠也加入这一“清谈”之中。初次相逢，令我诧异，这位东语系本科少年从师季羨林先生读古印度文化史，兴趣所在佛教唯识典籍考。大学三年时，被季羨林先生派往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及西藏学系进修梵文等古代语言，时仅一年，德国导师即准备给以博士论文题目。但他翩然归来。他这种游学方式与时下留学生扎根海外颇为不同。他说他喜欢在国内读书研究。相交既久，慢慢知道他不仅对欧洲汉学研究有所窥察，而且对中国经史典籍、近代学术史也有不俗的理解，其文章引经据典，写来通畅惬意，见赏于周一良、王永兴、汤一介、庞朴诸先生。我因那时校点熊十力先生的几部书，于近代中国佛教唯识学有所兴趣，亦就常常与文忠谈道论学，从他那里了解不少域外唯识学研究成果，受益匪浅。由于对近代中国学

术史种种问题看法相近，曾与他合作过两篇小文刊于《读书》杂志。记得其中一篇为纪念黄季刚而作。文忠写的那些文字，对一身侠气的黄季刚执意拜刘师培为师且始终不渝执弟子礼尤为称道，才知道他感慨当今大学里“师道之不传久矣”，故从师季先生时曾行叩拜礼，并一直执弟子礼极恭，实在是“心向往之”且表彰于笔端。而今大学里的师生关系确乎少了一些古道之风。我也以为，“师之不存，道之不存”，这是中国学术衰退的原因之一。我们真的需要重温韩愈的《师说》。我与文忠相交往，不愿以师尊相接，即是秉承韩愈之说：“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文忠以大学四年级时写的一篇《试论马鸣佛本行经》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季羨林先生评为满分，因犯了个时代错误，不得续读博士学位，返回上海。后来，又曾投考王元化先生之博士，考毕，仍未能就学。那几年不得学门而入，一时闲散，绝少写作，识得他的师友都为之惋惜。人生世事坎坷，文忠也体会了其中三味，变得老成持重多了。又幸得王元化、朱维铮先生之教，得以在复旦大学从容读书治学。两年来，文忠是“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学业大进。

新春伊始，文忠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写下这些话，以相警，且相慰也，是以为序。

1997年除夕夜于燕北园

怛逻斯之战

发生在公元 751 年的怛逻斯之战，不仅在战争史上占有地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造纸术的西传，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场著名战争的重要性当然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这是中外史上都有明确记载的一次战争；是历史上中国和大食（唐代以此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名称）唯一的大规模的而又是以中国唐朝军队失败告终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唐朝政府在西域统治史中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插曲；它又使得杜环有机会以一个战俘的“身份”游历八世纪中叶的伊斯兰世界而写出《经行记》这样的重要著作，等等。

为了能更清楚地了解怛逻斯之战爆发的背景，有必要追溯一下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关系。

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是伴随着冲突而开始的。起初的冲突只是名义上的，根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军事行动。大食东进的军队在 651 年纳哈万德（即今伊朗西北境，哈马丹西南之纳哈文德）之战中击败了波斯萨珊朝，翌年，萨珊朝灭亡了。而萨珊朝的一个王子叫泥涅师的来到了长安。在他的请求下，调露元年（679 年）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率军队护送泥涅师回去复国。这次行动最终是不了了之，但说明唐朝与大食已有了间接的冲突。

直到唐开元年间，唐朝和大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着开元三年（715年）唐朝与大食的第一次兵戎相见，起因是由于大食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注：即古乌孙，今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地方）王并出兵攻掠。拔汗那王向安西求救。为了控制西域各国，阻止大食势力继续东渐，都护李休景听从张孝嵩的意见，将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进攻大食军队，“下数百城……屠其三城，斩俘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取得了巨大胜利。

唐朝和大食的第二次战争，据《资治通鉴》记载，是起因于突骑施勾引大食兵马进攻安西四镇，史籍没有谁胜谁负的记载。

天宝六年（727年），西域副都护高仙芝进攻大勃律，虽然史乘中没有完全证明大食军队介入的资料，可是史学界认为这是唐朝与大食之间的第三次军事冲突。《新唐书·大勃律传》有记载曰：“大食诸国皆震恐。”

第四次刀兵相向就是怛逻斯（Talas）之战了。怛逻斯，据《西城地名》记载，自古以来有一水、一城皆以之名。“……水名至今未变，其城即中亚阿萨克斯坦之奥利阿塔，今名之为江布尔城。”羽田亨在《西城文化史》中认为怛逻斯之战发生在怛逻斯河畔，而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认为此战战场在怛逻斯城，后者的意见在中国古籍中可以得到印证，较为可信。

怛逻斯之战的起因据中文史料的记载是由于康姓九国之一的石国（即塔什干）国王“无藩臣礼”，高仙芝获准带兵征伐，石国国王不战而降，本来事至如此，大唐的面子也可挣回了，罢兵当上策，可高仙芝“悉杀其老弱……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见《资治通鉴》）石

国国王也被砍了头。

高仙芝的暴戾贪婪和杀了石国国王就给石国的一个脱身逃出的王子提供了理由。《新唐书·高仙芝传》记载：“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

此时的唐朝对大食已有所了解，所以高仙芝听到大食出兵的消息后，就亲率军队数万人迎击大食。

至于军队的人数，西域都护总辖汉族军士从未超过三万，或超出点也有限，除了留守之外，能出战的恐仅有二万余人，加上高仙芝征调的西域各国的“胡兵”，也不大可能有杜佑《通典·边防类总序》中所记的七万之多。但也不可能像《新唐书·李嗣业传》、《旧唐书·李嗣业传》所记的二万人之少，想来汉胡军队加起来，大致会有三四万的。大食方面的军队也包括了西域某些国家的军士，人数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战斗规模来看，恐不会少于唐军。

战争一开始，久经沙场，被称为常胜将军的高仙芝就犯了远离据点、在很难保证给养的情况下冒进百余里的兵家大忌。正如《旧唐书·李嗣业传》所载李嗣业对高仙芝说的那样：“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援兵。”

唐朝与大食两军相遇在怛逻斯城，战斗空前激烈和残酷。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相随唐军远征的葛逻禄部反叛，和大食夹击唐军。唐军腹背受敌，乃大乱，争相奔走，大食军乘势追杀，唐军惨败。高仙芝也只是靠了右威冲将军李嗣业击杀和唐军一同远征的拔汗那部堵住逃路的士兵，才得以幸免一死。但数万唐军只剩下数千人，二万余人被大食俘虏。

奇怪的是，这场唐朝损失惨重的战争好像并没有使唐朝和大食结下什么不解之怨。不仅大食商人在战后经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至德二年（757年），大食还应唐朝的要求，派兵随西域

各国军队一起帮助平定安禄山的叛乱。

这场战争不仅证明了战争理论上的一些准则，还极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么一条真理：当武力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用武力战胜或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和国家，它必定反过来要为被征服国家的文明所征服。

中国文明通过二万多战俘，极有力地向西方传播，当然大食以及西方的情况也随某些战俘的回国而得以传入中国。如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杜环回国后就撰写了《经行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伊斯兰世界。这部著作已佚，可是从别的史籍对它的引用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价值。

在和这场战争关系较密切的西传的文化事业中，造纸术无疑是最重要的。著名东方学家季羨林先生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中指出：“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就和这次战役有关”，“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在被俘的中国士兵里面有造纸工人”，“这些造纸工人把自己的技术传给阿拉伯人，从撒马尔罕向外传播，随着阿拉伯势力的扩张，愈传愈远，传到报达，传到达马司库斯，传到开罗，传到摩洛哥，终于传遍全欧洲，传遍全世界”。

造纸术的西传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座光辉夺目的界标，如果从这个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考虑，怛逻斯之战是否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呢？文化的传播在古代虽然常常是伴着剑与火的，可是前者难道不是比剑与火与血更有意义吗？

（原载《东方世界》1987年第3期）

《痴华鬘》撰者姓名小考

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书店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特编印《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共十五种。今已不可多见的书籍按初版原貌影印刊行。内收王品青先生校点之《痴华鬘》。

此书原版封面有疑古玄同（钱玄同）之隶书“痴华鬘”题签，内扉页则印有“尊者僧伽斯那撰”七字。此本无问题可言。然此书外新加一书皮，上题撰者为“伽斯那撰”四字，以“伽斯那”为撰者姓名。乃联想及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蓉生之《百喻经译注》，其书首页即刊有鲁迅先生之《痴华鬘·题记》。蓉生注鲁迅先生原文“天竺僧伽斯那……”为“伽斯那古印度的一位佛教法师……”（见《百喻经译注》页3）。并于页5之今译部分中译为“这是印度僧人伽斯那……”，并于下文中又见“佛教法师伽斯那”云云，显然蓉生亦以“僧伽斯那”四字为“僧人伽斯那”。

案，此误。今见诸本《痴华鬘》（《百喻经》）皆题“尊者僧伽斯那撰”七字，印度语言文学王邦维博士在其所辑之《佛经故事选》（重庆出版社，1985，页15）亦未将“僧伽斯那”四字分拆。吕秋逸先生所著《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十分精审，于撰译者仅载可靠之朝代与本名，古本中屡现之尊称皆略而未载，故可引以为有力证据。《目录》页73，号0894云：“百

句譬喻经五卷。〔僧伽斯那撰〕。萧齐求那毗地译。永明十年(492年)出〔祐〕。后题百喻经〔开〕。”则吕秋逸先生及王邦维博士、诸古本(于体例观之)皆以作者名为“僧伽斯那”四字,非“伽斯那”。

又案,“尊者”梵文为 Bhagavan,“僧伽斯那”则为 Samghasena 无疑。则撰者即名“僧伽斯那”,不可误为“僧人伽斯那”。

上述以撰者名为“伽斯那”之误,一因于译本体例未加深究,更因不谙梵语之故。

(原载《南亚东南亚评论》1988年第1辑)

西书东说十则

《佛教导论》

《佛教导论》(Einführung in den Buddhismus)

乌尔利希·施奈德(Ulrich Schneider)著。作者生于1922年,在莱比锡大学通过博士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957年又在该校通过教授资格考试,现任明斯特大学印度学教授。他的主要论著有:

《摩奴的抢苏摩:神话与仪式》(Der Somaraub des Manu-Mythus und Ritual, 1971)。

《阿育王的大摩岩石铭一精校本,翻译和铭文分析》(Die Großen Felsenedikte Asokas-Kritische Ausgabe, Übersetzung und Analyse der Texte, 1978)。

他还是“福来堡印度学研究”(Freiburger Beiträge zur Indologie)的编者,这一套重要的学术丛刊始于1968年。施奈德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和中古印度语,宗教史。

《佛教导论》由达姆斯塔特(Darmstadt)的科学书社(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出版于1980年。

全书分《导言》《历史上的佛陀》《佛陀的教义》《团体》《向大众化的发展》《大乘》等五章。正文部分共194页。书前有前言,

后附有参考文献和孔罗特·美西克 (Konrad Meisig) 编的索引以及四幅图片和二幅地图。

该书比较偏重于哲学教义。第四章尤其重要, 里面讨论了三次结集、阿育王时期佛教的对外传播、经典传承。特别重要的是, 168 ~ 170 页专门论述“原始佛典”(Urkanon) 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这个领域的真正的开拓者是陈寅恪先生留德时曾问学的海因里希·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 他的巨著《原始佛典语言考》(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柏林, 1954) 堪称经典著作。我国季羨林教授曾以一系列卓越的论文对此领域作出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比如《〈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定位》(德文)、《中古印度语中语尾 -a m 向 -o 和 -u 的转化》(德文)、《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判定佛典年代的标准》(德文) 和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季羨林先生的其他一些论文, 比如《〈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研究》等, 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在佛教史上存在着那么一部特定意义上的“原始佛典”。季羨林先生的贡献之一是将大量的汉文资料引入讨论, 实际上解决了一系列诸如巴利文之 *sakā nirutti* (梵文 *sakāya niruttiyā*) 应如何解释的大问题。季先生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印度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吕德斯和季先生的意见遭到了国外许多学者建立在不令人信服的研究基础上的反驳。爱哲顿 (F. Edgerton) 曾在他写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中以五节的篇幅 (只计《引言》) 与季先生论战。

施奈德教授描述了从 1956 年弗劳瓦纳 (E. Frauwallner) 提出“原始律藏” (Ur-Vinaya) 起近年内的研究结论, 肯定了烈维 (Lévi) 和吕德斯的贡献。作者把问题归纳为两点:

(1) 佛陀生活在东部而巴利文又是一种西部方言 (季羨林先